



刘文飞 著

伊阿诺斯，或

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
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

双头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文飞 著



伊阿诺斯，或

双头鹰

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
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刘文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04-5907-6

I. 伊… II. 刘… III. 文学流派—研究—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676 号

责任编辑 潘少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两个被强加的概念	(1)
第二节 两派对峙的前史和余脉	(3)
第三节 两派对峙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10)
第四节 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16)
第五节 两派的争论对俄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21)
第一章 斯拉夫派概述	(28)
第一节 斯拉夫派的构成	(28)
第二节 霍米亚科夫	(39)
第三节 两位诗人:雅济科夫和丘特切夫	(44)
第四节 其他几位大作家	(55)
第五节 阿克萨科夫父子	(62)
第二章 西方派概述	(71)
第一节 西方派的构成	(71)
第二节 格拉诺夫斯基	(83)
第三节 “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89)
第四节 接近西方派的大作家	(99)

第五节 西方派与俄国文学·····	(113)
第三章 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论争·····	(121)
第一节 通信的缘起和背景·····	(121)
第二节 论争书信的主要内容·····	(128)
第三节 两位书信作者的文字风格·····	(136)
第四节 通信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144)
第四章 阿瓦库姆的《生活纪》·····	(153)
第一节 阿瓦库姆的“生活”·····	(154)
第二节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活纪》·····	(158)
第三节 阿瓦库姆与俄国宗教分裂运动·····	(169)
第五章 《哲学书简》:两派思想分野的开端·····	(177)
第一节 “流动讲坛上的教师”·····	(177)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的结合·····	(180)
第三节 爱祖国与爱真理·····	(183)
第四节 两派之争的起源·····	(187)
第五节 恰达耶夫与俄国文学·····	(192)
第六章 《往事与沉思》:两派斗争的珍贵写照·····	(197)
第一节 赫尔岑及其“思想的力量”·····	(198)
第二节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204)
第三节 两派思想论争的生动记录·····	(208)
第四节 赫尔岑关于两派之争的思考·····	(223)
第七章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书信论争·····	(233)

第一节	“文学的首领,诗人的首领”	(234)
第二节	果戈理的“精神遗嘱”	(237)
第三节	别林斯基的当头棒喝	(248)
第四节	关于这场争论的几点感触	(258)
第八章	脱离“土壤”的“群魔”	(263)
第一节	《群魔》题解	(264)
第二节	《群魔》的写作动机	(269)
第三节	《群魔》的内容和结构	(279)
第四节	对西方派的一场清算	(285)
第五节	“一部有倾向性的小说”	(294)
第九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和“思想”	(301)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的“道路”	(301)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呼应	(306)
第三节	俄罗斯“悖论”	(312)
第四节	俄罗斯是“东西方”	(320)
第十章	利哈乔夫关于俄罗斯的“思考”	(333)
第一节	20 世纪的同龄人	(333)
第二节	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合唱原则”	(338)
第三节	“斯堪的纳斯拉夫”	(343)
第四节	一位独特的西方派	(348)
第十一章	索尔仁尼琴的“政论三部曲”	(355)
第一节	《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	(356)
第二节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	(360)

第三节	《倾塌的俄罗斯》	(366)
第四节	“三部曲”中的两个主题	(370)
第五节	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	(374)
第十二章	沃伊诺维奇:《神话背景下的肖像》	(379)
第一节	沃伊诺维奇其人	(379)
第二节	“索尔仁尼琴综合征”	(383)
第三节	一个意味深长的讯号	(388)
后记		(392)

绪 论

第一节 两个被强加的概念

俄国人的“如同一根贯穿的红线”的说法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运用，而在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历史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就是这样一根或隐或现、几乎贯穿始终的“红线”。

作为文化史概念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出现较晚，大约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但这两个词汇的出现要稍早一些。俄语中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是个组合词，前半部的“славяно”意为“斯拉夫的”，后半部的“фил”有“爱好者”的意思，在俄语构词法中，фил 的用法很灵活，既可以作为前缀，如 филантропист（博爱主义者）、филэллины（希腊之友），甚至如 филология（语文学）和 философия（哲学），也可以用作后缀，如 библиофил（图书爱好者）和 термофил（好热性微生物）。Славянофил 的字面意思，就是“热爱斯拉夫人的人”。这个组合而成的词，据说最早出现在俄国诗人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тюшков，1787—1855）的一首讽刺诗中，他这首题为《忘川岸边的幻象》（Видение на берегах Леты，1809）一诗中的主人公，是个有些愚蠢的诗人，这位诗人曾发出感慨：

“我是个酷爱斯拉夫人的人。”（Аз емь зело славенофил.）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展开争论后，西方派把这个词挑了出来，扣在对方的头上，用来讽刺对方对那些斯拉夫古风旧俗的热衷。斯拉夫派也针锋相对，称对方为“西方派”（Западник），这同样是一个组合词，由俄语中的“西方”（Запад）和表示人的后缀 ник 组合而成。笔者没有查明“西方派”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出现在什么地方，但它的出现无疑是在“斯拉夫派”一词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论证的双方都对强加于自己的名称不感兴趣，很少用其自称。至少是在这两个概念流行的最初，两派都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两个词中所包含的嘲讽意味。例如，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舍廖夫就曾主张用“本土派”（туземники）和“独特论者”（самобытники）等概念来取代“斯拉夫派”，但终究没有获得广泛的接受。

在汉语中，Славянофилы 和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一般都译为“斯拉夫派”（或“斯拉夫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这没有什么问题。而 Западники 和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 则存在多种译法，通常译为“西欧派”^①，又译“西化派”^②，还有译“西方派”者。笔者以为，还是第三种译法更好一些，译“西化派”似有发挥稍过之嫌，译“西欧派”则似乎缩小了该概念的原意，因为原文中只有“西方”（Запад）而无“西欧”（Западная Европа）。在当时争论双方的心目中，所谓的“西方”自然主要是指英、法、德等西欧大国，但在宗教、文化层面上，相对于俄国的西方，往往就是整个拉丁化了的西方世界，甚至包括教会合并之后的希腊和一

① 如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一卷，第 147 页；刘宁主编：《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 页。

② 以·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些接受了天主教的中东欧国家如波兰等，以及北欧诸国。到了当代，俄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其内涵和外延无疑都更加宽泛了，至少包括美、加、澳等北美和大洋洲国家在内。因此，“西方派”这个更接近原文、更模糊一些的译法，使用起来也许会更贴切、更方便一些。

在两派的争论过程中，以及后来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称谓还有很多，如“西方派”就常常被称为“改革派”（реформаторы）、“拉丁人”（латинцы）或“激进自由派”（радикальные либералы），而“斯拉夫派”的“别称”就更是五花八门了，除了科舍廖夫提出的“本土派”和“独特论者”外，还有“改良派”（реформисты）、“温和自由派”（умеренные либералы）、“民族派”（националисты）、“传统派”（традиционалисты）、“东方派”（восточники）和“土壤派”（почвенник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称谓，不仅体现了两派理论体系自身的庞杂，同时也是两派思想斗争之复杂性的一个折射。

第二节 两派对峙的前史和余脉

查阅俄国的相关工具书，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定义的第一句大致都是这样的：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一个社会—哲学思想流派。也就是说，均强调这是两股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社会文化思潮。如前所述，“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个词在19世纪最初十几年间就已相继出现，但作为一个文化、思想史流派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确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才正式形成的。卢纳察尔斯基曾指出：“40年代是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互相斗争这一标识下

过去的。”^①然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作为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两种思潮、两种文化倾向,只不过是 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发生了最激烈的碰撞,而在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都一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对峙。不能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看成是俄国历史中一个独立的、短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和转换、渗透与交融,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分野,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 16 世纪,在俄国一些最有文化、文学价值的古代文献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注重东方和倾向西方这两种思潮由来已久的对峙。这里仅举两部文献为例。

在 16 世纪中期爆发的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公爵的书信之争(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中,就包含着关于东、西两种不同政权体制、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宗教传统的争论。伊凡四世在致库尔勃斯基的信中,不仅痛斥了库尔勃斯基及其叛国行为,同时也谴责了库尔勃斯基所投靠的“西方”;而库尔勃斯基在致伊凡四世的信中,竭力把自己塑造为“一位优雅的西方文化的代表”^②。有意无意之间,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两人似乎成了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势力的体现者和代言人。伊、库两人的书信争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面对东、西两种文化时艰难抉择的一种窘境,同时也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史上两种不同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长期对峙的内在动力之一,于是,伊、库之争也就可以被我们视为 19 世纪

① 卢纳察尔斯基:《论俄罗斯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6 页。

② Я. С. Лурье: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с Курбским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м.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Наука, М., 1993, с. 214.

中叶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一个遥远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Исто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России）中论及伊、库之争时，就曾将伊凡四世的体制定义为“东方意义上的专制政权”，并在将其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度做了比较之后，指出了伊凡四世革新的局限性及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库尔勃斯基，“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却“没有奴才的情绪”，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西方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①由此可见，早在两种价值取向出现碰撞的初期，两者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就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势。

到了17世纪中叶，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及其《生活纪》（Житие）又为我们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分裂、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对峙提供了某种参照。阿瓦库姆的《生活纪》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作为一部宗教文献，它又首先是俄国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大牧首尼康（Никон，1605—1681）于1652年在俄国开始推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俄国社会的一次大分裂（Раскол）。俄国教会追求东正教世界主导地位的企图虽然在教会内外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在面对拉丁化的西方宗教和世俗世界的态度、在通过何种途径谋得俄国的正教领袖角色等问题上，教会内外的人士却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以尼康及其继任者和追随者为代表的官方教会人士，主张通过改革教会礼仪、修订经书等方式谋得与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接轨”，并进而谋得中心位置；而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俄国分裂教派，则主张捍卫俄国传统宗教礼仪的神圣性和俄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并以此来彰显俄国教会的纯洁和正宗。这场宗教分

^①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т. 1, М., с. 191—192.

裂,对俄国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曾指出:“在人民熬过‘乱世’刚刚40年的时候,教会的分裂又震撼了整个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家,动摇了国家的精神和生活基础。在此后的三百年间,东正教再也未能在罗斯恢复其崇高的活力,那一活力曾支撑俄罗斯人民的精神达五百余年之久。”^①阿瓦库姆等人为抗拒尼康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斗争,既是俄国民族性格中分裂元素的体现,反过来又加大了这一分裂的程度。在谋求俄国和俄国教会的强大这一点上,官方教会和分裂教派本无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对其实现方式的不同认识,竟然会导致两种观念如此尖锐的对立,如此激烈的对抗,回顾俄国历史上每一次价值取向上的东、西之争,其模式和情景也大致都是如此。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激烈争论,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暂时缓和下来,农奴制问题的解决,客观上使两派同时失去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但是,俄国社会中两种价值取向的对峙,却并没有随着农奴制的取缔而结束,而一直或明或暗地持续了下来。

在19世纪60—70年代,随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土壤派”理论的逐渐成熟,俄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片反对和清算40—50年代的“虚无主义”的呼声,斯拉夫主义的势力似乎一时间有所壮大。但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塑造的“新人”形象及其代表的新的“子辈”,由赫尔岑所倡导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向西方寻求理性精神和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背景相呼应,很快就又使得俄国的社会思潮向西转了。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为代表的“路标派”,第一次提出了俄国要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这可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合理

①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Голос, М., 1995, с. 7.

的选择，一个坚持、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民族，如果不能在某一个范畴获得霸主的地位，另辟蹊径、另立山头就是一个必然的出路了。白银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别雷，曾计划写作一部以《东方还是西方》（Восток или Запад）为总题的小说三部曲，旨在探究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揭开俄国的发展之谜。三部曲的前两部《银鸽》（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1906）、《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1912）相继写成并出版，而第三部小说却没有完成。别雷自己在1914年关于这两部作品所说的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银鸽》，这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因此，这里出现了恶魔（长有鹰喙的鸽子）。《彼得堡》，这是俄国的西方，亦即阿里曼（古代波斯宗教中的罪恶之神）的幻想，在那里，技术主义——即逻辑之赤裸裸的抽象，创造出了罪恶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则是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①到了20—30年代，别雷还在继续他的“东张西望”，写作了小说《莫斯科》（Москва，1926—1932），他自称这部小说为“反彼得堡”（Анти-Петербург），他在小说中认为，俄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东方，而主要来自西方。“莫斯科和彼得堡”、“东方和西方”，在别雷这里已经不是具体的地域概念或文化概念，而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往往就表现为“土壤和文化”、“自发性与唯理论”、“天使与恶魔”、“肉体与精神”等的对立。别雷的“东西方论”是文学性的，是体现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具有什么纯理论的色彩，但他的创作至少表明，对东西方冲突问题的关注，也是白银时代作家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整个苏联时期，西方的马克思理论和东方式的集权制度居然获得了相当持久、和谐的结合，苏联社会中的东西之争反而减

① А. Бельй: 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М. 1990, с. 13—14.

弱了；一个传统的欧洲强国，突然被视为东方阵营的首领，被柏林墙挡住去路的俄国式社会主义洪流，却滚滚向东倾泻而来，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民族文化取向的大转折中，却反而很少有东西抉择的两难心态的体现。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首先，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使不同思想倾向的争论变得不太可能，甚至连产生某种思想倾向的前提都不再存在了。其次，在东方阵营赢得的老大哥地位，暂时满足了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国理想，在面对西欧列强时常常流露出的局促，甚至自卑的民族心理，如疾风中的一片乌云那样迅速地飘逝了，洋溢在整个民族中的乐观情绪，让人们不再愿意纠缠于那些伤脑筋的抉择问题。最后，苏维埃帝国庞大的红色疆土，横亘在欧亚之间，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东西方的合成体，国境之内的东西方的和睦共处，甚至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俄国人心目中的东西文化裂痕。然而，在整个苏联时期，向东还是朝西的两种社会价值取向仍在时隐时现地发生碰撞，比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看法，比如斯大林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尖锐对立，比如苏共二十大之后“解冻”时期《新世界》杂志与《十月》杂志以及稍后与《青年近卫军》杂志的激烈争论，比如持不同政见文学出现之后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与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民族派两者之间的较劲，比如苏联解体前夕文化和文学界传统派和民主派两股势力的搏杀，等等，都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潮改头换面的对峙。

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放弃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举动，但是在这个放弃—选择的过程中，不是没有过犹豫和摇摆的。现在的多数俄国人都有一种感觉，觉得解体前后的全盘西化无疑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妥当的，模仿美国体制进

行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迅速转变为西方阵营中的平等一员，反而使其国力衰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其世界影响也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解体之后俄国国内一时惨不忍睹的局面，实际上是对西方派及其学说的一个嘲讽，一个打击；那么，走另一条路会怎么样呢？历史不可能给俄国人重新尝试一次的机会，但普京当政以来的一系列举措，显然是在矫正最近十余年来的激进和冒进。与普京的政治举措不谋而合的是，在思想、文化界也有一些人在进行这种矫正，或者说是在进行更为冷静的思考：比如，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比如，利哈乔夫关于俄国的“北方属性”的观点。就连一些新生代的现代派作家，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涉猎，维克多·佩列文在为中文版《“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中曾说道，“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那部中国小说中，一只猴子开始了旅行，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只猴子的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们可称之为人类特征的东西。在俄罗斯版本中，正如从该书的头几页上就能看出的那样，所发生的一切恰好相反，——为了去适应新的社会，人不得不努力地获得诸多猴子的特征”。作者想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想揭示的，就是在俄国社会不断西方过程中人的精神退化，因此，他强调说：“俄罗斯的‘西方’打一开头就是一个虚拟之物，这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天堂，通向它的道路就是犯罪性的富裕方式。”^①

最近，笔者又在网上看到一部新书，题目叫《西方派和民族派：对话能否进行？》（Западники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Возможен ли диалог？），这部厚达 475 页的论文集，是由“自由使命”（Фонд

^① 维·佩列文：《“百事”一代》，刘文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